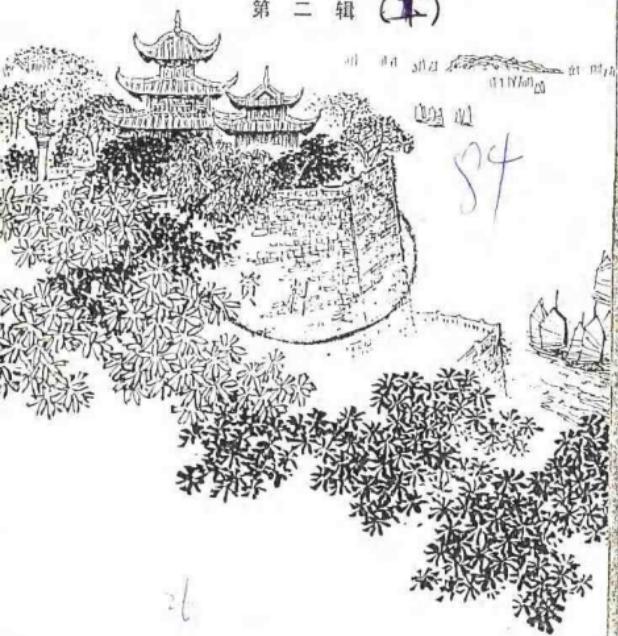


18.06

岳陽文史

第二辑 (本)



84

26

岳 阳 文 史

第 二 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岳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七月

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为文年生同志亲笔题词：

生年教育者萬頤
書贈文年生同志
毛澤東

前　　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编印了《岳阳文史》第二辑，作为奉献给这一光辉节日的礼物。

根据全国政协关于文史资料工作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中共岳阳市委要求在今年国庆节前，普遍地向全市群众进行一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和热爱党的教育的精神，本辑安排了“革命人物”、“革命斗争史料”、“城乡建设史料”、“工商经济史料”、“文教卫生史料”和“日、伪、匪、特罪行史料”等六个专栏，共二十四篇文章，一十四万余字。其中多数史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岳阳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几个阶段中的斗争风貌，热情讴歌了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美丽富饶的伟大祖国和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深刻揭露了国内外敌人给岳阳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本辑也以一定篇幅，介绍了岳阳市的源流沿革、名胜特产和风土人情，以期有助于全市人民更好地了解岳阳，更深入地热爱岳阳，从而迸发出更高的改革热情，为加速岳阳市的两个文明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

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致死的文生将军和蔡爱卿将军，是岳阳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

让更多的岳阳人民了解他们的卓越功勋和高贵品质，现根据初步征集到的有限史料，撰写了两篇纪念文章，以寄托家乡人民对这两位名将的哀思。我们竭诚希望所有熟悉文生将军和蔡爱卿将军的党内外老同志，多多向岳阳市政协提供有关史料，协助我们早日完成《文生将军传略》和《蔡爱卿将军传略》的编撰任务，以告慰先烈英灵于九泉，激励后人奋起于盛世。

在本辑组稿和审定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赵力宽、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原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有福、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何能彬、广东体育学院党委宣传部长邱志杰、解放军军事学院办公室秘书徐平蒋、文生将军的夫人苏枫、蔡爱卿将军的夫人韩静萍、中共岳阳市委书记李朗秋、岳阳市人民政府顾问李兴尧、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唐孝葵、湖南省政协文史办主任毛注青等同志的关怀和指导，现趁本辑出版的机会，谨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不高，加之编印时间十分匆促，本辑一定存在不少错误和缺点，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岳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革 命 人 物

- 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文牛生同志 岳仲理 (1)
智勇双全、高风亮节
——记蔡爱卿同志的生平事迹 方祖辉 (17)

革命斗争史料

- 辛亥岳州光复前后 何光岳 (38)
南下支队进击大云山 晏岳林 (45)
迎接岳阳解放活动纪实 尹远玲 (50)
忆湖北人民自卫军岳临直属队 方毅人 (57)
记“四·一三”岳阳学生运动 陈树荣等 (66)

城乡建设史料

- 岳阳古城浅录 柳仁祥 (75)
新墙河史话 李儒凤 (86)

工商经济史料

- 从金星铁工厂和五金合作社到制冷设备总厂
..... 岳阳制冷设备总厂厂史编写组 (100)

- 名贯古今、香溢中外的君山茶 杨应涛 (111)
私营岳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兴衰 李书鳌 (121)
味腴酒家 李培天 (127)
岳阳传统小吃——冰糖莲子 李培天 (135)

文教卫生史料

- 今昔岳阳楼 何钦法 (140)
岳阳“三校”合并中的一场斗争 邓子瑞 (161)
岳舞台始末 陈湘源、钟德华 (168)
追述普济医院 邓文彬 (186)

日、伪、匪、特罪行史料

- 日寇在岳阳的暴行 吴健人等 (191)
记洪山血案 高冰绪、方祖辉 (200)
日寇飞机轰炸岳阳目睹记 冯大德 (210)
日寇给新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曾介吾 (213)
“四·三”反革命暴乱案 方毅人 (220)
反革命分子火烧城陵矶 柏兴智 (226)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233)

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文年生同志

岳 钟 理

一九〇七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文年生同志出生于今湖南省岳阳县新墙区五垸乡云天村文家屋场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饱尝人世的辛酸，八岁时帮一家富农放牛，十岁起到舅父家学裁缝，十四岁又流落到湖北学木匠。一九二五年，他刚满十八岁，即抱着“为穷人找一条生路”的愿望，投身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由于受到连党代表的进步思想的熏陶，文年生同志毅然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和李贵同志（后任红军师长，长征中在贵州边界同白军作战时壮烈牺牲）等七、八人在长沙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八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中南军区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先后当选为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红岁月，文年生同志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始终如一，无私无畏，忘我战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他的卓越功勋和高尚情操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财富。

英勇善战 屡建功勋

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红军第一、三两军团在永和市会师，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参军不久的文年生同志听了连长的战斗动员后，立即报名参加“敢死队”。他冒着激烈的炮火，勇猛冲锋，奋力拼搏，用刺刀杀出了红军的威风。战斗结束后，党组织根据文年生同志的突出表现，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为了保卫苏区，文年生同志和战友们一道，在瑞金县龙岗一带围歼白军前敌总指挥、师长张辉瓒所部的战斗中，奋勇杀敌，取得了歼敌九千余、活捉张辉瓒的重大胜利，使进入苏区的敌军狼狈逃窜。这次反“围剿”结束后，文年生同志受到了团长的嘉奖，并被提拔为连长。

一九三一年五月，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不久，担任红三军团第三师第十一团团长的文年生同志，在率部攻打文英镇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一举全歼据守该镇的白军，战后受到师首长的嘉奖。

一九三一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文年生同志率部与白军在草鞋岗激战时，不幸右腿中弹负伤。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极差。为了争取早日重返战场，文年生同志主动要求在不实施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他忍着难以言状的痛苦，让医务人员割开肌肉，取出弹

头。术后他用麻绳缠着刺刀作为固定架，绑在右腿上，并且咬紧牙关，坚持推拉锻炼，终于很快地伤愈归队。文年生同志的这一感人事迹迅速传遍全军，并再次获得师首长的嘉奖。

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到达贵州的红一方面军占仁怀，陷茅台，三渡赤水河。当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团团长的文年生同志，奉命率部掩护主力向川西进发，在清崖与前来堵截的白军三个旅鏖战了一天一夜，胜利完成了任务，自己也再次负伤。战后，文年生同志受到三军团首长的嘉奖。

一九三八年，文年生同志担任第十八集团军一二〇师七八八团团长，率全团指战员两千余人，日夜守卫在黄河西岸，外御日寇进攻，内反敌顽磨擦，不仅在宋家川一带两次打垮企图偷渡和强渡黄河的日寇，而且还亲自带领一支部队，袭击盘踞在王老婆山的日寇，消灭其一个中队的大部，为此，受到了留守兵团司令部的通报表扬。在当时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我军的这些胜利，有力地鼓舞了敌后人民的抗日热情，也给予友军以良好的影响。

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所属的九十师，派出一个团的兵力，自同官、瑶曲一线向我警备一团一营驻防的胡家峁发起猛烈攻击，企图突破关中分区，进而侵犯延安。一营以劣势装备，抗击三倍以上全副美式装备的敌人，加上所处地形不利，从早晨打到下午，被迫放弃三个山头，撤退到最后一个主阵地上。当时担任关中分区司令员兼警备一团团长的文年生同志正在一团指挥所驻地庙湾

指挥战斗，他听到这一消息后，不顾参谋人员的劝阻，于黄昏时匆匆赶到胡家峁。他借着月光详细观察了丢失的三个山头，又派出侦察人员对敌军的前沿阵地作了进一步的侦察，然后召集一营连以上干部开会。他针对个别干部信心不足的情况，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有钢铁般的毅力和打硬仗的传统。现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看着我们，如果这一仗打不好，敌人就会通过这里进犯延安。为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一定要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把丢失的山头夺回来！”文年生同志还根据当时敌强我弱、地形对我不利的情况，决定发挥我军夜战、近战的特长，连夜命令一、三、四连正面反击敌人，二连从侧翼迂回，直捣敌军团部。战斗虽然打得十分艰苦，但终于捣毁了敌团部，击毙了敌团长；不仅收复了白天丢失的三个山头，还乘胜追击，一举占领了瑶曲。当我军反击胜利的消息传到警一团团指挥所时，干部战士纷纷议论说：“文司令员打仗好厉害，真是一个‘猛老虎’啊！”从此，文年生同志这个“猛老虎”的外号就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分区和警备一旅。

工作第一 艰苦深入

文年生同志有一句座右铭：“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拼命工作的义务，没有偷闲享受的权利。”他言行一致，不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进城以后的和平环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

一九四一年春，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封锁，党中央决定在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文年生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特制了一把八斤重的锄头，抓紧部队战斗和训练之后的空隙，带领关中分区和警备一旅的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上山开荒。他的双手打满了血泡，锄头也磨熔了一寸多。几个月时间，就把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全部开垦出来，种上了小米和苞谷。同志们辛勤汗水，换得了机关生产的大丰收。文年生同志对警备一旅所属三个团的生产也抓得很紧，除经常用电话了解情况外，还多次深入各团驻地进行检查督促，因此，全旅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如驻鄜县高窑的警备二团一千五百人，在担负二百多华里守备任务的同时，共开荒三万多亩，不仅种了旱粮，还插上了水稻。当毛主席得知关中分区所属部队不但在训练上抓得很出色，而且开展大生产运动也是全边区的先进单位之一时，高兴地亲笔题词：“生产教育，二者兼顾。书赠文年生同志。毛泽东”，以表彰文年生同志在领导大生产运动中所作出的优异成绩。

一九四五年七月，文年生同志奉党中央命令，由延安率部南征，经中原去两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他的爱人苏枫同志在延安七里铺刚生下第一个儿子。由于产后体弱，孩子缺奶，苏枫同志十分盼望正在延安准备出发的丈夫能够抽空回家看看。但是，把革命工作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年生同志却没有满足妻子的这一要求。他全身心地投入南征部队的整训工作，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就在部队出发前的一个星期，他突然病

倒，发高烧，拉肚子，经中央医院奥罗夫大夫诊断为急性肠炎，需要住院治疗。文年生同志感到南征出发的时日迫近，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当体温刚刚恢复正常，腹泻尚未停止，便婉言谢绝了医生们提出继续留院休养的好意，带上一点鸦片止泻药，坚决离开医院赶回了部队。这时，部队已经整装待发，文年生同志将工作妥善安排后，才匆匆来到七里铺和家人告别。当他把婴儿轻轻地搂在怀里时，小家伙竟被这又黑又瘦的父亲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妻子嗔怪地说：“你快四十岁才得了一个儿子，难道就不想多亲一亲这个宝贝？”文年生同志沉思片刻后，用亲切的口吻回答道：“苏枫，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应该时刻想到党的利益和革命的大局。这次毛主席亲自对出发南征的同志说，我们从红军开始，十年内战，八年抗日，如今要打出去，要杀回大别山、井冈山，去发动和组织全国的老百姓，建立一个幸福的新中国，这是何等崇高的事业啊！我文年生要没有共产党，连性命早就不保了，哪里还会有这个幸福的家呢？”他一看队伍出发的时间快到了，忙把孩子塞到爱人怀里，边说边提起装着日常用品的马褡子，大步走出了房门。他一步也没有停留，策马离开了奔腾清冽的延水河，毅然踏上了南进的征途。

斗转星移，人间换岁。一九五六年六月间，负责分管部队后勤工作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年生同志，为了深入了解基层单位的情况，先用一个月时间，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区，检查了三十多个部队医院和一批军用仓库；随后又背着

酷暑高温，花了半个多月时间，深入到广东珠海市附近的大横琴岛和广西台山县的上川岛等十多个沿海岛屿，了解守岛部队的战备和后勤供应情况，一路风尘仆仆，行程几千里。他不顾白天在车、船上的颠簸劳累，晚上坚持找干部战士座谈和听取汇报，经常工作到深夜。

一九五八年十月，文年生同志响应中央军委发出的“将军下连当兵”的号召，来到驻守在离广州八十公里的罗浮山某部五连当列兵。这时，他已年过半百，加上多次负伤，身体大不如前。但文年生同志处处以普通一兵严格要求自己，白天和战士们一道，或是出操训练，摸爬滚打；或是参加劳动，锄地浇粪，样样都干。夜晚，他和战士们同睡一间房，不是辅导大家学习，就是找战士谈心。不久，他患痢疾住院治疗，刚刚三天，听说连队要去农村支援秋收秋种，他毅然提前出院，随连队来到五里路外的生产大队，整整七天时间，他和战士、社员一样，从早到晚坚持参加劳动，有时累得吃不下饭，他就用开水泡着饭吃。当地农民从这位双鬓斑白的老兵身上，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胆忠心。

文年生同志在广州军区工作十多年，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哪怕正碰上吃饭时间，也要先到军区党委报到，然后再回家休息。

克己奉公 关心他人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日，文年生同志和苏枫同志在关中分

区所在地马兰结婚了。举行婚礼的那一天，他仍然穿着打了补钉的军装。几天以后，苏枫同志笑着问他：“你这个当司令员的‘新郎官’，为什么总是穿着一身补钉衣服呢？”文年生同志回答道：“我的祖父和父亲做了一辈子长工，终年劳累，不得温饱，我从小就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只有当了红军，日子才慢慢好起来。这套补钉军装比我过去穿的强得多了！”

他们婚后不久，警卫员李得有同志从供给部领来一个新脸盆。文年生同志发觉后，立即要他把脸盆退回去。李得有同志解释说：“家里仅有一个脸盆，你出差带走了，苏枫同志只好用提桶洗脸，作为一个司令员，家里多领一个脸盆算不了什么特殊化”。文年生同志严肃地教育李得有同志：“一个脸盆的价值虽小，但我们如果产生了自认为对革命有功就可以多占公物的思想，发展下去，问题可就大了。”事后，他拿出自己的津贴费，请李得有从商店买来一个脸盆，把从公家领来的退回了供给部。

全国解放以后，文年生同志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作风。一九五二年文年生同志在担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时，曾用浏阳夏布做了两件衬衫，一穿就是上十年，谁也看不清上面究竟打了多少补钉。后来实在无法再补了，他就亲自动手，将两件衬衫并成一件，又穿了几年。一九五五年六月的一天，广州军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给他家的所有窗户都装上了纱窗布。文年生同志回家问明情况后，叫人把装好的纱窗布取下来，退还给公家。管理局局长叶昆同志向他

解释说：“这批布放在仓库好多年了，又不是新买的，你就留下算了！”文年生同志语重心长地回答道：“军区机关这么多干部，我如果随便占用公家的东西，怎么好教育其他同志永远保持我军艰苦奋斗、一尘不染的优良传统呢？”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家住在广州军区大院，门前有几棵葡萄树，每年葡萄成熟了，文年生同志总要摘下大部分送给机关其他同志尝尝新。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他从不含糊。

为了使艰苦朴素的作风代代相传，文年生同志十分注意教育子女从小养成勤劳俭朴、不图享受的良好习惯。一九五四年，他们夫妇从长沙调来广州工作时，有人提议把几个孩子一起迁来，以便生活上照料得周到一些。文年生同志坚决不同意这样作。他说：“我从八岁起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这虽然是旧社会逼出来的，但对我后来的成长却大有好处。现在孩子们的生活条件好了，更要注意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能把他们娇宠坏了。”他决定把三个已经上学的孩子继续留在长沙育英小学读寄宿，两个未到入学年龄的小孩送到河南一个小县城的外婆家抚养，两个太小的孩子才带在身边。五年以后，在长沙的孩子虽然迁来广州，但文年生同志偏偏不让他们上离家很近、条件很好的八一子弟中学，却叫他们上离家很远，一向以艰苦办学著称的广雅中学读寄宿。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六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四个孩子从学校回来，一齐向父母诉说学校生活太艰苦，希望同意他们转到八一中学读书。文年生同志一方面询问孩子们所在的班级各有多少学生，为

什么其他同学都能够坚持就读，唯独你们要求转学？一方面谆谆告诫孩子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父母是领导干部就产生优越感，人生的道路很长，一定要靠自己走下去，依靠父母亲的荣誉过日子是最没有出息的。孩子们听从父亲的教育，打消了转学的念头，但希望带些零食到学校里吃。文年生同志考虑以后，只同意一个年龄最小、体质较弱的女孩带点炒米去。过了一段时间，小女孩提出要向三个哥哥姐姐看齐，连炒米也不带了。一些旁观的人觉得文年生同志这样对待子女，似乎缺乏“人情味”，但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文年生同志却把严格教育子女看成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履行的天职。在文年生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几个孩子不仅都在广雅中学读完了中学课程，而且学习都很刻苦。如大儿子文戈夫，初中毕业考试，各科成绩都是五分，高中毕业考试，各科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一九六四年参加全国统考，被录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年生同志共有六个子女长大成人，他们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但学有所成，而且表现都好。在文年生同志的冤案还没有平反昭雪以前，他们以自己的思想觉悟和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都由各自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年生同志要求自己和家属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从不乱花一分钱，但对其他同志的生活疾苦却关怀备至，乐于解囊相助。

苏枫同志的表哥陈美和，自幼父母双亡，生活一直很窘迫。一九五〇年第一次写信给苏枫同志请求帮助，当时部队仍